

# 刺向香港日寇的一把尖刀

## ——港九大队市区中队概况

方兰

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市区中队于一九四三年底成立，一九四五年十月结束，历时一年另十个月。这个中队是根据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而成立的，活动于香港市区内和九龙半岛一带。在特殊的环境里，采用特殊的方式方法对敌人进行斗争，把日本侵略军牵制在市内，象一把尖刀插进敌人心脏，达到里应外各的作用。

市区中队属港九大队直接领导，采用单线联系方式。中队长兼指导员方兰，还有陈佩雯（陈敏）、黄扬声、宋洛川等几位党员为骨干。开始只有十多个游击队员，在斗争中逐步发展壮大，到一九四五年春，已发展到三百多人的队伍，分布在市区敌人的各个要害部门。中队设在西贡槟榔湾。

市区中队斗争的方法，采用“纸弹战”，即在政治上对敌人开展政治攻势，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和作垂死挣扎的事实，宣传国内抗日战争的战绩和国际上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好形势，宣扬我党我军在抗日战争中的重大作用，从而教育广大同胞，鼓舞斗志；同时进行分化瓦解敌人，使日本侵略军不得不把一定兵力投放在市区内。在经济上，千方百计刺探情报，并用适当方式方法

狠狠打击敌军；同时动员爱国青年参加抗日武装队伍。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市区中队做了如下几项主要工作：

一、对敌人开展政治攻势。

所谓政治攻势，就是开展宣传活动，在政治上向敌人发动进攻，通过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港九同胞投入抗日救国斗争，使敌人陷入四面楚歌之中。

中队成立初期，白手起家，没有宣传工具，宣传品也只能靠大队部发下来，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我们决定建立自己的油印室，由梁佩云（梁芸）负责油印室工作。梁原是香港学生，后来在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当职员，她刻字又快又好，能写几种字体。她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刻印宣传品。油印室的工具十分简陋，没有油印机，用屐皮代替滚筒；没有刻钢版的钢笔，用留声机唱针代替。油印室地址，最初设在香港砵甸乍街一个小阁楼上，这小阁楼又窄又闷热，只放一张床，以床当桌子用，可以避开日敌和邻居注意；后来迁到黄炜英（苏平）同志家里。那时，敌人时常入夜宵禁，管制灯火，所以夜间工作要用毛毡遮窗，避免光线外照。后来，又在九龙深水埗砵兰街一个游击队员家里建立第二个油印室，由黄静仪同志负责。黄没有公开职业，中队每月只发给她二十多斤大米和少量菜金，生活十分艰苦。除了上述两个固定的油印室外，还在其他游击队组员家里刻印过宣传品。

有了油印室，宣传品就更多了。印发宣传品的内容，以摘录《前进报》有关东江纵队的战斗消息为主，也有报道本市区斗争情况，还经常编印战斗口号。当时印发的口号，记得有：

“欢迎曾生司令员到香港、九龙！”

“同胞们，盟军就要反攻了，希望你们协助！”

“工友们，你们三五成群进行怠工吧！破坏敌人生产！”

“商人们，你们不要投机倒把，影响同胞生活！”

“警察们，只眼开只眼闭吧！不要敲诈勒索自己的同胞！反攻时协助我们作战！”

为了适应向敌人开展政治攻势的需要，中队出版了《地下火》小报。内容主要是根据抗战形势的发展，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报道我军抗日战绩，发表教育群众的文章，动员人民起来抗日救国。由中队几位同志撰稿，曾发表过《牛地湾战斗》、《刘黑仔打特务》、《市区中队炸火车桥》和港九大队战绩等。还曾筹办“七一”专刊，摘录发表毛泽东同志《论联合政府》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部分。

散发宣传品的方法：（一）是公开张贴。在热闹市区或当众显眼的街道、日敌机关的布告栏、卫生间以及工厂的材料堆和工具箱，都是我们贴宣传品的地方。一九四五年五月的一天，天刚亮，中环街市日敌的布告栏上出现一张印有红色火把的《地下火》。一个卖猫鱼的妇女捅了捅隔邻卖咸水蚬的老头，低声说：“你看那是什么？”老头走过去一看，回来伸了舌头，向卖猫鱼的妇女伸出大拇指和食指，暗示八字之意，并悄悄地说：“苏联红军胜利了！”这时，布告栏前已围满人群，人们看了默不作声，有些人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走开了。

有一次，九龙深水埗游击组员老梁去张贴传单，突然来了一个伪警。他问：“你贴什么？”老梁把手上提着的马灯高举，照着传单说：“看吧！你也是中国人，不要死心塌地替日本人卖命！”那伪警看到传单上写着刘黑仔名字，吓得目瞪口呆，好一会才说出话：“我是不得已为混碗饭才干的。”老梁顺便教育他一番。临走，吩咐那个伪警五分钟后才能离开这条街，伪警一动不动地点头答应。

(二)是向群众有计划地递送和组织轮流阅读。对一些有民族气节的人,我们将宣传品送到他家去,或装作路上拎来的送给他阅读,并留意听他的反应。对反应一般的,继续向他作宣传教育;反应强烈的,进一步启发他;对有些经过帮助教育之后,表示要为民族利益而斗争的,我们就吸收他参加游击队。

(三)对一些伪职人员,我们有针对性地把一些宣传品投递到他家或工作地,主要是警告他们,叫他们不要再干坏事,分化瓦解他们。也收到一定效果,如笕箕湾伪区长曾某,接到我们给他的宣传品之后,对家人和一些亲属公开阅读,并说他是不得已才做这差事的,他揭露了日本鬼子的暴行。后来他只身逃回老家去了。

张贴标语和散发宣传品,都是夜间进行,快贴快送快撤退。因为人地熟悉,经常变换地方。为了防止意外,遇到便衣特务时,每个游击组员都有两手准备:一是晓以大义;二是必要时准备牺牲。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一九四四年二月的一天早晨,陈佩雯同志把一卷《东江纵队成立宣言》放在一只漂亮的手提袋里,上面盖上毛线。自己穿上一件很时髦的红格大衣,大大方方地经过岗哨。两个伪宪查(一男一女)叫她打开手提包,陈佩雯镇定地打开,那伪宪查从手提包里掏出这卷宣言问,“这是什么东西?”陈佩雯说:“你自己看吧!”宪查看见一行醒目的红字《东江纵队成立宣言》,立时被吓得脸发青了,赶快又把宣言塞进手提袋里。陈佩雯也捏了一把汗,赶快过海来,到亲戚家换了衣服,才把宣传品送到交通站。后来据说那个宪查是一个游击组员的哥哥。

除了几百名游击组员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外,还有不少游击之友和他们的亲属也参加战斗。他们之中有年逾花甲的老太婆,也有十岁八岁的小孩子。他们以

能散发几张传单、为游击队做些事情而感到光荣。他们很多人还为游击队做了大量的运输和保管工作。

## 二、破坏敌人军工生产，运走敌人军用物资。

香港是日本到南太平洋的一个中转站和补给站，所以日军在这里设立许多船坞。船坞是侵港日军的主要军工工厂，由海军领导。除船厂外，还有生产军用鞋子的胶鞋厂、印制军用票和中储券的中华书局印刷厂，以及一些小五金厂生产子弹和手榴弹等的工厂。破坏敌人军工生产，是市区中队对敌斗争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 （一）发动工人怠工，破坏军工生产。

在日寇的铁蹄下，香港工人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每天都有人饿死在街头。日本鬼子动不动就打骂工人和扣工资，搞得人心惶惶，工人们心头已有一团怒火。我们就因势利导，用各种办法组织工人怠工，使一天的工作量三天也没完成。为了防止被敌人发现，各个车间、工场相互联系，派人“睇水”，工人们怠工时，就三三两两围成一堆，议论各地新闻。我游击组员一面从中了解情况，一面因势利导，鼓动工人不要为日寇卖命。一九四四年夏天的一个中午，美机空袭太古船坞，当场炸死三百多人，我们即利用工人（包括日本人）的害怕心理，鼓动工人们不要为敌人卖命；并经常制造一些假空袭情况，人们（包括日本人）就拼命往防空洞跑，使工厂停产。在这过程中，我们团结了一批工人，发展了一批积极分子，从而壮大了我们的队伍。

### （二）偷运日军物资。

当时工人们都过着十分困苦的生活，每人每天只配六两四大米，后又减为三两二，自己养不了自己，更谈不上养活妻儿，许多工厂的工人都处在饥寒交迫之中，他们不得不偷走工厂的物资去出卖。我们十分同情这些工人，认为他们偷运日军物资既能解决生活困难，又可破坏日军的军工生产，于是我们布置游击组员，在有条件和可能的情况下，把日军的物资偷运出厂。由于游击组员和广大群众胆大心细，一年多，始终未被发现。

### （三）破坏各种生产设备。

我们破坏敌人的生产设备和物资的行动，多是发动工人群众一起进行的。我们把工人发动起来了，他们又帮助我们出主意，破坏敌人的生产。如太古船坞的机械车间工人们，在加工切削地雷壳及迫击炮弹壳时，将接口螺丝牙放得过松或加工得过紧，使接口不牢靠，或是旋不上盖子，使产品不配套，让它报废。后来敌人有所发现，规定每台车床生产的产品，要登记操作者的姓名。针对这些情况，我们又对验收的华人工长进行教育，使他们在验收过程中马虎了事，不让日敌找出次品是那个工人干出来的。

红礮船厂主要生产登陆舰和维修舰艇。这个厂因受美机的连续轰炸，生产受到一定损失，后来，日敌把造舰的一些设备运入防空洞，改为生产炮弹。我们便布置炸防空洞，已把炸药运了进去，因“七•一三”事件而中止。一九四四年初，我们游击组员带饭盒入太古船坞时，把黄色炸药放在下面，再用饭盖上。带进厂后，立即把炸药放到钢管内藏好，敌人没有发觉。

这种破坏敌人生产的行动，不只限于各船厂，中华书局印刷厂也进行得很巧妙，他们在油墨中放上钉子等异物，印纸的电版便被异物弄坏了，不得不再另制

电版，既花钱，又花时间，影响了生产进度。度量车间把纸张量得不合规格；机修车间不是弄坏机器，就是倒洒油墨，或弄脏白布（印刷时要用白布）或纸张。日本人常常大发雷霆，责问日人工段长和中国籍的班长，但因抓不到证据，也得了不了之。

### 三、开展军事斗争。

市区中队开展军事斗争，根据大城市的特点，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一是搞情报；二是搞爆破为主的武装斗争。

#### （一）情报工作：

由于中队活动在敌人心脏腹地，收集情报任务很重，大队要求广泛收集日军的的活动情况，迅速送交大队和司令部。收集情报的内容很广泛，有军事、政治和经济各方面，还有系统地由专人收集的“日敌舰艇往来情况”。

中队首先弄来了日本海军各种舰只的型号识别图。对照着图，就可以识别航空母舰、巡洋舰、驱逐舰、登陆舰、运输舰等等。我们把港口方位绘了位置图，编了号，如“A1”、“A2”、“B1”、“B2”……。

我们有个游击组员，家在坚道半山上，推开房子的北窗，港口可尽收眼底。用望远镜仔细观看，连舰上的编号也可看到。这样，她每天负责观察，什么舰船在那个方位，她都一一记下来，又用极薄的纸写上象火柴头那么大的小字，交给交通员，转送大队部，天天如此。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分析，我们大致摸到了敌舰的活动规律。



对日敌舰艇的修理、制造等情况，也是我们收集的情报内容。这些舰艇到厂维修，不少是伤痕斑斑，我们就打听这些舰艇从哪里来？修好后又往哪里去？同时把这些舰艇的性能、用途、数量，以至一些图纸收集归类后，送交上级。

游击组员们冒着极大危险收集这些情报，有的为此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红磡船坞机密图纸车间有一位游击战士叫单柱贞，经常设法偷出机密图纸送给部队。一九四四年初，盟军飞机来进行地毯式轰炸，厂内工人、日本人都拼命逃跑，他本来是个长跑好手，完全可以比别人更快地躲进防空洞，可是他不走，为的是利用这一混乱场面，取得机密图纸。不幸这车间挨了一枚炸弹，被炸死于战斗岗位上。时年二十岁。另一位女战士张咏贤，她为了取得“敬记”造船厂的情报，不幸被捕而英勇牺牲。

军情方面的情报，如日寇占领的启德飞机场（原是民用机场，后改为军用），游击组员黄尖在该场工作，他机警地把机场的平面图偷了出来，我们立即送交了司令部。我们还把敌人的军工生产如子弹、手榴弹的工厂、仓库作了调查，逐一登记，并绘了简单的图纸，送给大队部。我们还打进了敌人的一些机构中去，如日军宪兵部、派遣队、伪区公所等。当中有王文同志等人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情报。

经济方面的情况，我们也很重视。对日军生产的物资和数量、质量、用途，也都一一作了调查了解，及时向大队汇报。

## （二）爆破：

在敌、伪多如牛毛的地方进行爆破，既能打击敌人，又可扩大政治影响，鼓舞群众起来抗战的信心和决心。于是，中队挑选了一批勇敢机智的游击队员先学



习爆破技术；同时，设法把炸药、雷管、钨丝、导火线等物品运入市内，分散藏在游击战士家里，伺机行动。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一日，美国飞行员克尔中尉在轰炸香港时，被日军击落，他跳伞落在郊区沙田山地，我游击队小交通员李石把他隐蔽在附近草丛里，日军眼看飞行员落在沙田山地，出动上千人包围搜索，结果毫无所获。他们恼羞成怒，疯狂地向我港九大队反复扫荡。为把日寇兵力牵制在市内，我们决定把深水埗、亚皆老街的第四号铁桥墩作为爆破目标。

这条铁桥位于市中心，是横跨大街的天桥。为了不杀伤人，也不准备炸毁大桥，目的是要起扰乱敌人的作用，所以爆破时间选择在四月二十二日深夜十二时。方法是用定时炸弹引爆。执行这一任务是老梁和他领导的几个游击组员。

头一天，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忽然发现钨丝与导火药（用七九子弹药粉）燃不着，又怕三十多斤黄色炸药和两个雷管响声不大。他们要求中队赶快多送几个雷管和七九子弹粉。中队接此要求，十分焦急，因为从中队部到市内的交通要道，都有敌人重兵把守，他们在原来的岗哨之外又增加岗哨。正在着急当儿，急中生智，安排一个十一岁的小鬼亚庆仔牵着一头牛，将雷管和子弹粉装在牛竹内，亚庆仔镇定自若地拿着牛竹，赶牛过岗哨，及时地接应了梁大哥。入夜，老梁几个人，迅速地把定时炸弹和炸药放好，又把指针拨正十二时，便迅速撤离桥墩。时钟刚敲响十二下时，一声巨响，我们的行动成功了！

第二天早晨，港九全市戒严。敌伪人员全部出动，进行大搜捕。开到郊区和宝安去扫荡的日军，也被拉回市区。这就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这次威震港九的“四月大行动”，既锻炼了全体游击组员，又粉碎了敌人扫荡的阴谋。市区中队受到大队的表扬。

### （三）动员组织爱国青年参军。

动员和组织爱国青年到游击区参加抗日，也是我们中队的一项政治任务。游击组员们向青年朋友进行宣传教育，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动员他们参加抗日救国，并输送一批青年工人和学生到游击区参军。这批新游击队员，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我游击组员中的亲朋戚友，如陈佩雯动员了七人入伍，其中有两个是她的妹妹。张景也动员了七人入伍，其中有两个是他弟弟。另一种是有志气青年，经教育后，出于热爱祖国和对日本侵略者的义愤而勇敢加入游击队的。

### 四、建立交通线。

交通线的任务也很繁重，传递文件、运送物资和护送人员来往，都要通过交通线。从中队部到市区，共开设了四条交通线，每条交通线有专职交通员。

那时，敌人在市区内实行军事管制，经常突击检查，码头、车站和交通要道都设有岗哨，由日军、印警和中国籍宪查组成班排把守，四周还有便衣特务，除固定岗哨外，公路上有还巡逻侦察，海面上有“铁拖”和“小电扒”，戒备十分森严。

初时我们市区中队由于人力少，缺乏经验，对交通线上斗争的复杂性认识不足，所以出现“三七”两个交通员被捕事件。后来经过认真总结，吸取教训，提高了认识，并创造许多斗争的经验，保证交通线畅通无阻。我们的交通线是这样进行工作和活动的：

（一）交通员群众化。我们物色的交通员，除政治可靠、机智勇敢外，还要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中队部负责从郊区到市区边缘的交通员，多是当地的农村妇女，她们与群众一道，挑着柴草到街上去卖，又买回农村需要的东西，就在买卖过程中和市内交通员接头，互相交换情报，然后，各自分散回去。

（二）伪装好所携带的材料和物资。为把所带东西伪装好，有时把送出去的情报藏在柴草、青菜、木瓜、芋头等物品内；有时又放在担竿、竹帽内，游击队员肖镜是维记牛奶公司的工人，他把情报藏在牛奶桶内，通过岗哨送往市区。

对一些重要的情报，都用密码密写，交给正式交通员传送。这样，一旦有什么意外，也不会立即暴露内容。

（三）要求交通员要遵守严格的纪律，保守机密，并严格执行规定时间。有一次，亚维回中队部时，半路遇大雨，他擅自决定在附近村庄一个进步群众家过夜。

就在这天晚上，中队领导立即作了紧急部署：转移文件材料；连夜疏散人员，并准备第二天早上还不见她回来，就要通知市内交通员调查情况。第二天她终于回来了，受到了严肃的批评。

原先，我们的交通线都要经过日军岗哨，后经多方调查发现，有些水客不用经岗哨，是因为他们买通了那些宪查，这样就可以用小船在偏僻的海边，按约定时间上船，偷渡到新界地方。于是我们有时也用此办法，不久又开辟了一条从茶果岭到香港的水上交通线。这条线虽不用经岗哨，但有时也会遇上突击检查。

由于我们的交通员勇敢、机智、镇定，所以遇事都能化险为夷。有一次，伍娇正挑着一担青菜，乘菜艇由茶果岭到湾仔，小艇刚要靠岸时，眼见日军、印箸、宪查站在岸上。这时她的菜担里藏了一大捆《前进报》，但她不慌不忙，不急于上岸，让别人先走。人们上岸后排成队，伍娇故意放慢脚步走在后面。那些伪宪查用铁枝插进每担菜里，一连插了七、八担而一无所获，怕麻烦了，便不再查看，走了。伍娇一直是镇定自若，毫无惧色。当她回来汇报时，我们为她捏了一把汗，又为我们有这样坚定、机智的交通员而骄傲。

又有一次，中队接到大队通知，要我们代购一些刀叉及高级食品，给刚被我们营救的美国飞行员使用。这任务交给吕少枚去办。吕到湾仔买好东西后，即按原来交通线回中队部，不料上船后，船迟迟不开。船家说：“前面那条船的‘罗白头’（指日本人）不给开，这船可能开不成了。”吕焦急万分，怕当天回不来会急坏中队长。正在思考怎么办时，两个日本鬼子和两个伪宪查已下船检查。这时，她想到自己是一个光荣的交通战士，不管怎样，要镇定应付。伪宪查问她去哪里？她答“茶果岭。”“做什么？”“探舅父。”当伪宪查翻了吕的手篮，看到了较好的蛋糕时，吕马上说舅父多病，病了很久，想吃点好东西。他又往下翻了一下，见还是食物，便走开去检查别的乘客。如果宪查继续往下翻，就会见到刀叉，那就麻烦了。因为农村人是不用刀叉的，而当时正值美国飞行员被我营救后，日本鬼子到处搜索的时候。吕少枚这次回来比平时晚了一个钟头，就在回来半途遇到中队部派出专门等候她回来的同志。

## 五、中队的组织建设。

发展游击组员，一般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才能吸收。新游击组员入队时，要履行入队宣誓仪式。参队后，要履行义务，定期联系。对没有职业、生活有困难的组员，发给一点生活补助。不少游击组员还能在自己薪金收入中，尽量节衣缩食，以能上交经费支援部队为己责。

要求组员要生活于群众之中，衣、食、住、行都要和群众一样，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带领群众投身到抗日斗争中去。

组织形式与领导方法：开始，我们沿用中队下的小队体制，后改为分区分队领导。领导骨干最初总在中队部槟榔湾和吊草岩，我们感到这样游击组员常来联系容易暴露，而且会发生不必

要的横线关系，增加暴露的可能性，便决定领导骨干分头到市区去领导，并相应建立各种制度。几个领导骨干只有开中队会议或学习才到中队部。中队骨干每人都有几个住地，以便出现情况可以随时转移。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代号，如区市中队曾经代号为“新华队”；我的代号为460；陈佩雯为461，黄扬声为461。每个人的住地都有安全或不安全的标志。并定出各种组织纪律，如：原来认识的游击队员，现在没有关系，就不要来往，见面也不打招呼，甚至是爱人也如此；约定见面碰头时间，一定要准时，不能过早或过迟；时时提高警惕，防止敌人跟踪；文件材料不需要时，立即烧毁；听到看到什么情况，立即如实反映；一切生活行动要按规定去做，小心谨慎，不能暴露自己身份。总之，斗争要大胆、心细，绝不能让敌人摸到我们的规律，要使我们时时取得主动。

六、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主要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教育：

（一）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揭露敌人对我国残暴的侵略罪行，结合每个人身受其害的事实进行教育，以此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和增强斗志。我们还同时系统地 从鸦片战争、八国联军、清政府割地赔款、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等历史事实，一直到日本侵略东北三省，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广东沦陷等等，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也说明做亡国奴的痛苦、屈辱，指出只有斗争才有活路，只有斗争，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我们又照《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作为我们的行动口号，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二）进行革命气节教育。每一个组员入队时，我们就教育他们要有为祖国牺牲的决心，要宁死不屈。特别指出我们市区中队在敌人的心脏之中进行战斗的特点，要不停息地开展工作，给敌人以打击。这也随时会有被敌人发现而逮捕的可能，我们要经

受住严峻的考验，必须有非常顽强的斗志和具有宁死不屈的牺牲精神。教育中，我们列举了许多革命烈士如方志敏同志和我队冯芝老妈妈烈士的英勇事迹，去感动和教育了我们的队员。

（三）加强组织纪律教育。中队自始至终都十分强调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在特定的斗争环境和任务决定的。除严格要求每个游击队员必须遵守中队所定的纪律外，还规定：一旦有人被捕，不管被捕人员是否坚定，都要作最坏打算，有关人员都要转移、撤退。我们反复列举了许多事例，进行正反两方面教育。

（四）进行国际国内形势教育。国际上，第二战场开辟后，苏德战线及英美盟军作战情况；日军在东南亚的连连失败。在国内，在共产党坚持抗战的主张下，八路军、新四军前线取得辉煌战果，广大游击区军民顽强的斗争，以及我东江纵队战绩，都作为教材，大家感到更受鼓舞。如营救美军飞行员，海上队打击敌人，保护了海上旅客的安全，严惩汉奸等。这些材料大大鼓舞了大家对争取胜利的信心。

此外，我们注意总结经验教育，克服缺点，提高斗争艺术。注意表扬好人好事，鼓舞斗志；并及时传达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和纵队司令部、大队部的有关决定，使大家明确斗争任务。对无文化的交通员，还帮助他们学文化。虽然晚上大家已经很疲劳，煤油灯的灯光又很微弱，可是他们都要坚持读点书、写写字。

#### 七、关于“三·一七”事件。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七日，发生交通员亚四（袁益）与义务交通员冯芝被捕事件。简称“三·一七”事件。

我们有一个交通站设在西贡坑口。从坑口去香港的筲箕湾要坐小艇。筲箕湾附近有一个小岛，日军在这里设了一个管哨，检查来往船只。三月十七日，新交通员亚四从坑口送一批传单到湾仔，交给主动帮助中队做交通工作的冯芝老人（六十一岁，我的母亲）由她再转交给游击组员伍惠珍。伍家是个联络点，游击组员杨作光等人常来这里取宣传品。那天冯芝老人把宣传品交给伍后，又从伍家取回了一大堆东西交亚四带回中队部。因为亚四要带去的東西很多，冯芝老人担心他年轻缺乏经验，怕出什么差错，所以她就和亚四一起送回中队部。她把所带的东西分别缝在身上穿的衣服及其他衣物里。当天下午，两人乘船回坑口。到



笕箕湾岗哨时，不幸碰上突击大搜查。开始是一个中国籍的宪查来搜查，他从冯芝老人身上搜出一些东西。这个人还有民族天良，将搜出的东西顺手丢到海里去。跟着又一个印籍宪查来，把缝在老人衣服里的一些材料搜了出来。这样，两人不幸被捕。

当天，我们在坑口焦急地等到黄昏，终不见亚四回来，便立即向附近的艇家打听，才知道她们出了事。中队立即研究敌情，采取应变的紧急措施，第二天部署有关人员撤退和转移。

在狱中，冯芝老人感到问题严重，就对亚四说：“我自己就是死，也绝不连累别人。”教亚四说她只是同行的，什么也不知。并说：“你身上没有搜出东西，没有证据，便没有事的。”她自是编了个口供，说年老不识字，家里穷，出来做水客。是以前的一个邻居叫她把衣服带到坑口去，其他就不知道了。经敌人多次审问，她都是这个口供。敌人不相信，对她残酷地施加电刑，又放狼狗威吓，但她仍是这个口供。当转到笕箕湾宪兵派遣队时，老人见张咏贤同志也在那里，她们三人被监禁在一起。冯芝老人曾送过传单给小张，认识她。张咏贤当时十九岁，原是香港圣保禄书院的学生，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徒的家庭。她热爱祖国，对日寇在香港的侵略罪行十分愤怒。一九四四年一月经杨作光同志介绍加入游击小组。她表现积极勇敢，在电车上散发过《东纵成立宣言》和其他传单，并收集敌人船只和宪兵队的一些情报。被捕后因没有供出游击队一点情况，受到电刑和毒打，后与冯芝老人同狱。老人对她进行教育和鼓励，细声地给她讲革命故事，又喝：“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歌。她坚定地对小张说：“既然被捕了，就千万不要害别人，自己死就算了。”她对小张的生活也很关心，把家里送来的食品分给

她们吃。冯芝老人嘱咐前来探望她的同志说：“转告亚齐（我的小名），我绝对不会做对不起她的事，让她放心好了。”

后来，亚四因为没有被抓到证据，释放了。冯芝老人与小张被转去宪兵总部，囚禁在这里的都是重要政治犯。有人见她们，一个是瘦小的老太婆，一个是文弱少女，觉得有点奇怪，便问她：“老太婆，你是什么人啊？”冯芝老人自豪地说：“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这是我们炎黄子孙的一个多么崇高的称号。在日本法西斯主义面前，临危不惧，宁死不屈，表现了我中华民族的崇高气节！

日寇幻想在这一老一少面前打开缺口，得到一点游击队的消息，可是得到的是可耻的失败。后来敌人把她们转去赤柱监狱，最后转到海军刑务部（即海军军事法庭），把她们作为间谍处决。冯芝、张咏贤二位烈士，于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在香港加路连山英勇就义。

“三·一七”事件发生后，市区中队的同志们都万分不安，但没有因此而气馁，继续英勇战斗，很快就布置了“四月大行动”的战斗：爆炸九龙亚皆老街的铁桥；散发革命传单。同志们化悲愤为力量，更加狠狠地打击敌人，决心向两位烈士学习，学习她们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而贡献自己生命的崇高品德。

冯芝、张咏贤两位烈士的英勇事迹，被作为游击队员入队的第一课，以加强队员气节教育的活教材。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了，纵队奉朱德总司令的指示，迅速接受日军投降，缴收物资和武器。我中队立即行动。当时英军尚未到港，日军继续在各自的岗位上，声称要等候英军到来，向英军投降。

我游击组员知道九龙漆咸道的日敌岗哨内有一批枪支，日军正准备把它转移。黄灯明、何家日等同志商议后，准备好各种工具和宣传品，在天未亮时来到岗哨，把五十多支枪支和一批弹药接收送到中队部；同时，游击组员还在红磡船坞的仓库里，收缴了大批军用汽车的器材及通讯器材。谭志刚同志在图南造船厂拆下了一挺重机枪，是这大队收缴到的第一挺重机枪，很快就用去对付那些不肯向我投降的敌伪据点。各组员也分别缴到了不少物资，我们都及时向大队转送。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港九大队发表宣言，宣布奉纵队命令，完成了任务，撤出港九新界。市区中队不少队员被编入东江纵队继续战斗。他们对中队这段历史眷念不忘，表示要继续为祖国的繁荣、为同胞的幸福贡献力量。新中国成立之后，同志们以新的战斗姿态投入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